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4.009

“物转向”:21世纪以来的理论衍进、 内核演变与文学研究前沿生成

韩启群

(南京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受21世纪新的物人关系和危机语境的牵引和推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物转向”理论大潮在纵深衍进的同时发生了内核演变。以“新物质主义”为内核的21世纪“物转向”理论思潮凸显“物质动能”,通过消解二元论为主导的人类中心思维重塑物人、物物之间的纠缠互动关系。“物转向”理论思潮在21世纪的内核演变促成了“物转向”文学研究呈现从“转向物”到“转向物质动能”这一衍进趋势,开辟出一种具有明显非人类中心倾向的研究路径,深刻塑造了近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前沿的风格。

关键词:“物转向”;21世纪;内核演变;“物质动能”;文学研究前沿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4-0064-07

21世纪以来,人类所处的物质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激荡出人文社科研究的独特品格和视域。5G、AI、云计算等新技术加速融合和演进,其溢出效应不但推动了网络虚拟空间的快速崛起,也将人类裹挟进万物智联的数字时代,物人、物物始终处于虚实交融、泛在链接的状态。各种增强技术在改变人类身体的同时也模糊了人类肉身与技术的传统边界,不断进化的智能机器人给人类主体性带来严峻挑战。全球生态持续恶化,人类正站在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人与自然关系亟需调适。在此背景下,长期以来占据哲学主导地位的传统二元论话语无法适应当下全球生命政治和经济文化的新语境,其对物和物质性的思考“越来越不足以解释当代社会”^①。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以二元论为主导的传统“主流理性叙事”是现代环境危机、零和博弈思维形成的重要原因^②,无法为人类应对21世纪危机挑战、走出伦理困境提供理论方案。因此,有必

要重新反思传统二元对立思维在主体与客体、人类与非人类之间预设的本体论差异,有必要重塑21世纪“人类世、资本世、技术世”^③时代物人、物物之间的纠缠互动关系,以“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高度建构宇宙万物和谐共生、东西方文明互鉴互动的新秩序。

新世纪以来新的物人关系和危机语境不但推动了学界对于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批判和反思,也催生了人文社科领域对于能够突破人类中心话语的新理论模型的探寻热情。各种具有非人类中心特征的理论话语应运而生,并在时代土壤的滋养下迅速发展为声势浩大的“物转向”思潮。作为一场引发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本体论转向的哲学大潮,“物转向”这一提法不但成为对20世纪下半叶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的反拨,更意味着是一场与所处时代气质和精神高度契合的思想变革和理论转向。近十年来,西方学界与“物转向”相关的论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哲学、媒介学、

收稿日期:2023-03-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2YJA752026);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1SJZDA103)

作者简介:韩启群(1975—),女,江苏南京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南方文学、物转向、新物质主义研究。

^①Coole, Diana, Samantha Forest. “Introducing the New Materialisms”.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 Diana Coole, Samantha Forest, eds. Durham: Duke UP, 2010, pp.1-43.

^②Plumwood, Val. *Environmental Culture: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Rea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5-6.

^③吴冠军:《人类世、资本世与技术世——一个政治经济学—政治生态学的考察》,《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地理学、生物伦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前沿,深刻塑造了人文社科研究的格局和面貌。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物转向”这一术语不但指涉转向文学作品中形形色色的物质细节书写,还指涉受“物转向”思潮推动衍生出的众多批评概念和研究视角,如“物质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物导向文学批评”(Object-Oriented Literary Criticism)等。近年来,“物与文学”成为我国学界的研究热点,与之相关的成果也呈指数级增长。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在深入挖掘物在叙事文本中的价值时,对“物转向”思潮本身的历时演变与“物转向”文学研究之间复杂生成关系关注得不够充分。而厘清西方“物转向”思潮与文论演进之间的关系不但是理解和甄别当前“物与文学”研究热潮与意象派、背景要素等传统研究的核心区别所在,也是推动西方文论思潮“物转向”与中国本土“物与文学”研究传统的互阐互释的基础。因此,本论文拟聚焦西方“物转向”思潮与文论演进之间的关系,从该思潮的历时衍进和内核演变入手,推演以“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为代表的西方21世纪“物转向”思潮的新发展如何塑造近十年来外国文学批评空间,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归纳21世纪以来西方“物转向”文学研究的前沿发展趋势,以期为国内同类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 “新物质主义”：21世纪以来“物转向”理论思潮的纵深衍进

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就开展了与建筑、时尚物品相关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齐物论”等与物相关的哲学论述,但近年来我国学界常提及的“物转向”主要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席卷整个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大潮。20世纪下半叶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执牛耳者,如布罗代尔、布尔迪厄、福柯等,均在各自研究中关注能够体现社会秩序、权力关系的表层物质细节,推动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早期“物转向”;多学科领域对于物的共同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在这一时期汇聚为

一个独特研究领域。此外,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量子纠缠、生物工程为代表的前沿科技的迅猛发展大大改变了人类对于物的传统认知,尤其是量子纠缠原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物如何构成的认识。历史经验表明,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往往会成为推动人文社科革新和理论迭代的原动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具有动物学研究背景的唐娜·哈拉维创造了“赛博格”(Cyborg)概念,具有科技史研究背景的布鲁诺·拉图尔提出“行动元网络理论”(Actant Network Theory)。这些研究虽然受到了德勒兹、阿甘本、德里达等理论家的影响,但也很明显地呼应了自然科学领域关于物的新认知,蕴含了物物、物人互动混溶、生成纠缠的反二元论思维。如今,哈拉维和拉图尔已经成为21世纪“物转向”学者常常致敬的研究先驱,原因在于二者都试图打破人类主体和非人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标志着人文社科领域开始尝试跳出传统人文主义传统、与传统人类中心视角脱钩的重大变革。

进入21世纪,除了持续升温的物质文化研究,各种与物相关的哲学话语将“物转向”裹挟至一场更大范围的认识论、乃至本体论的全面转向。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的比尔·布朗尝试在现象学研究框架下重新阐述主客体关系,尤其是无生命客体所具有的力量,其“物论”(Thing Theory)和“物性”批评实践被评论界誉为“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方向的早期尝试”^①。哲学研究领域以哈曼、梅亚苏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为代表,尤其是哈曼在“物导向本体论”中关于物的本质的阐述被认为“与德里达对语言的关注背道而驰”^②;情感研究领域主要是以布莱恩·马苏米为代表的情动理论与“物转向”的交汇。受德勒兹的研究启发,马苏米从伯格森、斯宾诺莎等先哲汲取理论滋养来阐释“物质在流动的世界”^③,推动了新世纪以来与“情感物质性”相关的研究。此外,意大利哲学家罗西·布雷多蒂也不再囿于人文主义传统探讨主体性概念,转而借助“后人类”术语重新界定身体的具身性和环境嵌入性,成为

^①Epp, Michael H. "Object Lessons: The New Materialism in U.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2004, 34(3): 305-313.

^②Boscagli, Maurizia. *Stuff Theory: Everyday Objects, Rad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p.3.

^③Epstein, Andrew. "The Disruptive Power of Ordinary Things",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016, 40(2): 184-188.

人工智能时代破除身体与技术、自然与文化二元论的重要思想资源。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具有自然科学研究背景的简·本内特和凯伦·巴拉德的研究。从事环境科学研究的本内特提出“活力物质论”(Vibrant Matter),即“万事万物均有动能”,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宇宙万物都有活力的新型平等观,有力消解了基于人类中心特权的二元论。与“活力物质”概念形成互补的是巴拉德的“动能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后者以量子纠缠为科学源点引出破除二元对立死结的另一个关键思维,即物在本体上是一种始终处于纠缠和互动状态的关系性存在,进而为强调生成和纠缠的新物质主义互动本体论奠定了基础。

从上述“物转向”思潮在21世纪的衍进发展来看,“物转向”已经不仅局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所践行的“转向物”研究,而是已经扩容为涵盖“物论”“活力物质论”“动能实在论”等众多话语的异质理论空间。换言之,21世纪的“物转向”大潮虽然仍是一个多学科参与的研究界面,但研究重点已经擢升为从哲学本体层面关注物的物质性、物人关系本质的“物转向”2.0版的思想大潮。自2010年以来,学术界越来越倾向用“新物质主义”来统称人文社科领域“所有重新思考人与物质世界关系的新话语”^①。“新物质主义”这一术语几乎成为21世纪“物转向”思潮的代名词,如在《物质论》中,莫里奇亚·勃斯凯格里将21世纪“物转向”思潮的最新发展归纳为“新物质主义”的批评转向。虽然“新物质主义”和“物转向”近年来常被学界一起并置使用,但从对“物转向”思潮的历时梳理来看,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物转向”显然发展历程更长、涵盖范围也更宽泛,而“新物质主义”更多指涉的是21世纪初兴起的、受“物转向”思潮影响和推动的新理论模型。

从本内特、巴拉德等学者的研究来看,21世纪以来的“物转向”研究更为聚焦主客体关系的重塑,也更致力于消解二元论为主导的人类中心

思维。虽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哈拉维、拉图尔也有类似的努力,但只有到了21世纪,“物转向”大潮逐渐演变为旨在重新揭示物的本质、重新定义物人关系的新物质主义大潮。在众多新物质主义学者的携手努力之下,物的内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物成为活力之物,成为始终处于互动关系中的生成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物质主义几乎可以看成是21世纪“物转向”理论话语的内核,原因在于新物质主义提供了一系列与物相关的、且有别于传统物质主义的新思维、新观点、新阐述,为重塑21世纪“人类世、资本世、技术世”时代新物人关系提供了理论方案。

二 从“转向物”到“转向物质动能”： 21世纪“物转向”理论话语的内核演变

自20世纪下半叶,无论是人文社科领域对于客体的关注,还是物质文化这一独特研究场域,都有力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物转向”思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物转向”研究首先强调“转向物”。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抱怨评论界长期以来忽视物、将焦点“放在主题和情节上”的阐释习惯^②;物质文化研究者奥尔森认为,学术界应该为物“辩护”,纠正长期以来物的积极意义受到忽略、物人关系阐述不够充分的“尴尬”局面^③。其次是注重挖掘物的“意义建构能力”。以罗素·W·贝尔克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倡导研究物如何参与建构人的观念、情感和身份,而以布尔迪厄、福塞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则聚焦物的阶层区隔能力,如何“帮助完成严肃的意识形态工作”^④。对此,伍德沃德从三个层面归纳了“意义建构能力”:(1)作为价值标记或社会标记,行使区分功能,融合并区分社会群体、阶级或者部族;(2)作为身份标记表征人物的社会身份,帮助调节自我认同与自尊的形成;(3)作为“行动元”行使或体现权力关系,像福柯笔下圆形监狱一样成为政治权力场域。^⑤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者在推动人文社科领域“转向物”的同时,提出了诸如“物的社会生

①Epstein, Andrew. The Disruptive Power of Ordinary Things.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016, 40(2): 184-188.

②Freedgood, Elaine. *The Ideas in Things: Fugitive Meaning in the Victorian Novel*.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06, p.12.

③Olsen, Bjørnar. *In Defense of Things: Archaeology and the Ontology of Objects*. Plymouth: AltaMira, 2010, p.12.

④Grazia, Margreta de. "The Ideology of Superfluous Things: *King Lear* as Period Piece". Margreta de Grazia, Maureen Quilligan and Peter Sallibrass, eds. *Subject and Object in Early 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3.

⑤Woodward, Ian. *Understanding Material Culture*. Los Angeles: Sage, 2007, p.40.

命”(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物质无意识”(The Material Unconscious)等重要概念,展示了“物转向”研究的丰富面向和独到之处。“物的社会生命”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伊提出。在1986年出版的《物的社会生命》的导论中,阿帕杜伊以商品在不同阶段的动态过程以及产生的社会意义为切口提出商品具有“社会生命”的论断^①。通过聚焦商品的“前世今生”,克比托夫认为物在不同语境中“经历了在归类和相关意义上的转变”,这种意义的变化正是“物的社会生命”的表现^②。“物质无意识”由比尔·布朗在1996年提出。布朗借助这一概念呼吁批评者关注文学作品中“过度指涉”的日常生活物品,认为作家笔下“片段式出现”的物质细节一旦被“回顾”,能够揭示出“日常生活的意义结构和物质变化”^③。无论是“物的社会生命”所倡导的物的谱系研究方法,还是“物质无意识”概念所蕴含的“文化的物质性”思想,都为学界如何“转向物”提供了实践参照。

进入新世纪之后,“新物质主义”的兴起将“物转向”思潮推升至2.0版,构成了21世纪“物转向”思潮的理论内核。受新物质主义洗礼的21世纪“物转向”研究试图呈现一种基于物的内在活力、凸显“物质动能”(material agency)的新哲学观。换言之,对于“物质动能”的强调构成了21世纪“物转向”话语内核演变的核心推力。那么新物质主义所强调的“物质动能”从何而来?对此,主编库尔和弗罗斯特在《新物质主义:本体论、动能与政治》导论中首先归结为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原动力。量子物理学和混沌物理学关于物的科技新认知,尤其是物在量子层面的活力与纠缠原理被挪用至哲学领域作为“本体—认识论的基底来诠释物质性与物质活力”^④,颠覆了笛卡尔

实体论或牛顿机械论对物质的惰性描述。新物质主义学者巴拉德借用量子力学中的术语解释“动能”的作用原理,创新性地提出以“内在互动”为关键词的“动能实在论”,进而以互动本体论取代了经典物理学领域的二元本体论^⑤。除了自然科学领域的推力,“物质动能”还有着丰厚的哲学理论支撑,尤其是以海德格尔物性显现的现象学理论和以德勒兹生成论为代表的一元本体论,前者为布朗的“物论”提供了论述源点,而后者则成为本内特“新活力论”的主要立论依据。在2001年发表的著名论文《物论》中,布朗继承了海德格尔对于物性的现象学思考,呼吁关注“物的力量”(thing power),标志着物质文化研究开始进入挖掘物的力量、关注物的“物性”凸显的现象学研究新阶段;从本内特在《活力物质》一书中与“物质动能”相关的论述来看,斯宾诺莎一元论、德勒兹生成论为其提供了重要哲学灵感。

可见,21世纪的“物转向”思潮在强调转向“物质动能”时,内核已经发生演变。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物转向”研究虽强调“转向物”,关注物的意义建构能力,但并未触及物的本体论述,也未动摇长期以来占据哲学主导地位的笛卡尔实体论或牛顿机械论对物质的惰性描述。21世纪以来,从布朗关注“物性”显现的现象学研究、再到本内特和巴拉德关注物质动能和内在互动的新物质主义研究,“物转向”思潮已经突破20世纪末的文化研究范式,擢升为更大范围内的认识论转向、乃至本体论转向。从对“物质动能”概念的梳理来看,动能是一个不断生成、繁复交织的复杂动态过程,以多种样态涌现,人类和非人类的自然界都是通过内在互动施展动能^⑥。因此,21世纪的“物转向”思潮转向“物质动能”,不但从本体论层面“消解了无机和有机、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区别”^⑦,为

①Appadurai, Arjun. “Introductio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

②Kopytoff, Igor.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64-94.

③Brown, Bill. *The Material Unconscious: American Amusement, Stephen Crane, and the Economies of Play*. Harvard UP, 1996, pp4-5.

④张嘉如:《物质生态批评中道德伦理论述的可能性与局限》,《东岳论丛》2017年第1期。

⑤Barad, Karen.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76.

⑥Barad, Karen.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Matter Comes to Matter”. Serenella Iovino and Serpil Oppermann, eds. *Material Ecocritic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P, 2014, pp.120-54.

⑦Coole, Diana and Samantha Forest. “Introducing the New Materialisms”. Diana Coole and Samantha Forest, eds.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 Durham: Duke UP, 2010, pp.1-43.

构建基于动能的关系本体论或互动本体论奠定了哲学根基,而且也消解了人类优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传统理念,为铺设21世纪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平等、互动、共生的良性生态网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 “物转向”文学研究:21世纪以来的批评前沿与现状趋势

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物转向”,顾名思义,第一层意思就是“转向物”,从文学作品中形形色色、不同层面的物书写入手,思考“物是如何被想像在文学语境中,从而获得不同形式的生命”^①。而由于“物转向”这一术语又对应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至今的理论大潮,因此,文学研究领域的“物转向”也指涉受“物转向”思潮影响和推动的文学批评概念、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物转向”理论思潮本身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导致很难将“物转向”文学研究归纳为某一明确具体的理论范式,但从类似物质生态批评、物性批评等相关概念来看,“物转向”文学研究呈现了丰富的研究面向和创新活力,近年来活跃在文学批评前沿的很多理论话语,如情感生态批评、后人类批评等,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物转向”思潮的影响和塑造。“物转向”文学研究在吸引我国学界强烈关注的同时,亦让学者们产生诸多困惑,如“物转向”文学研究与传统文学批评中对物的关注有何区别?笔者认为,厘清上述问题,需把握两个基本点:一是21世纪新的物人关系语境与新世纪以来“物转向”文学研究趋势之间的逻辑关联;二是西方“物转向”思潮的历时发展和内核演变对于21世纪“物转向”文学研究趋势的影响和塑造。围绕上述两个源点加以考察,不但可以有效定位当前“物转向”文学研究的内涵,避免过于泛化的“物与文学”研究,也有助于学界在宏观勾勒“物转向”思潮历时发展的基础上理解和甄别当前“物转向”文学研究的重点、前沿趋势所在。

一方面,理解21世纪以来“物转向”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需回归文学发展乃至文论生成的时代语境。21世纪新的物人关系语境在牵引“物转向”思潮纵深衍进的同时,也塑造了“物转向”文学研究的新话题、新概念和新视角。一是受21

世纪环境危机推动的“物转向”文学研究的生态扩容。研究者聚焦各种非人类之物,如河流、能源、食物、植物等,不但有效展示了文学作品中环境危机书写的审美异质性,也大大拓展了生态文学研究疆域。物种濒危或灭绝、植被减少等生物多样性危机催生了文学作品中不同层级物种的跨物种叙事的兴起。擅长表现未来已来的科幻小说在近年来的研究热潮也是学术界对于21世纪危机语境的独特回应。二是受各类增强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的“赛博格”话语被延伸进文学批评场域,推动了“物转向”文学研究的后人类扩容。鉴于人类身体本身就是物质性存在,身体成为“物转向”思潮中重新思考人类、环境、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场域;以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为主导的传统思维遮蔽了身体的具身性,因此,“物转向”文学研究凸显身体物质性和情感生成性,为后人类批评场域重新思考主体性、人类身体与技术身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提供了思想资源。三是后互联网时代人类生存的新形态,尤其是人类肉身和泛在链接的网络空间的情感交互启发学界反思情感具身性、关系性、生成性等议题,推动了情感批评领域的“物转向”。正如凯勒和杰莉弗所言,情感批评的“物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后结构主义者过分强调话语、忽视具身经验的纠正”;某种意义上而言,“物转向”和情感理论是一致的,如“研究生物和化学因素——激素、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ω -3脂肪或铅——如何制约我们所经历的情感”^②。

另一方面,需在西方“物转向”思潮历时发展的纵向脉络中勘察“物转向”文学研究进入21世纪的内核演变和前沿趋势。21世纪以来西方“物转向”文学批评的发展和衍进大致对应了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述的“物转向”思潮本身的内核演变,即也经历了从“转向物”至“转向物质动能”的演变过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布朗为代表的学者倡导“回归物”,从具体的物入手开展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议题研究,不但塑造了“物质文化批评”这一独特研究视角,也为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的早期“物转向”提供了示范。21世纪以来,新

^①Tischleder, Babette Barbel. *The Literary Life of Things—Case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2014, p. 19.

^②Bladow, Kyle, Jennifer Ladino. “Toward an Affective Ecocriticism Placing Feeling in the Anthropocene”. Kyle Bladow, and Jennifer Ladino, eds. *Affective Ecocriticism: Emotion, Embodiment,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Lincoln and London, 2018, p. 6.

物质主义成为“物转向”思潮的理论内核,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将新物质主义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在“转向物”的同时,还注重挖掘文学作品中物的力量和动能,大大丰富了“物转向”文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值得甄别的是,在凸显“物质动能”的研究中,不同理论源点的学者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路径。以阿莱莫的“跨躯体”(Trans-corporeality)、伊奥凡诺和奥伯曼的“物质生态批评”为代表的“物转向”文学研究受到本内特“活力物质”和巴拉德的“动能实在论”的影响,将物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阐释挪用至人文社科领域,透视细菌、食品、垃圾等传统意义上无生命的物所具有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动能,在此基础上挖掘物物、物人的纠缠互动关系。此类研究者将“物质动能”概念拓展至文学叙事领域,将之与文学批评中的一些概念、术语进行巧妙嫁接,进而开辟并丰富了21世纪危机语境下新的环境批评路径。和“跨躯体”“物质生态批评”中蕴含的“动能”思维相比,以布朗“物性”批评为代表的“物转向”文学研究则有着明显的现象学观照。布朗聚焦物“如何制造意义,塑造或重塑主体,影响主体的焦虑和喜好,使主体感到恐惧或充满想象”^①,塑造了以挖掘文学作品中物质动能、物件与主体现象学相遇为核心旨趣的新型物质文化批评模式。

尽管不同文学理论家阐释“物质动能”的路径有所不同,但一致之处在于,都试图在文学批评中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非人类中心研究路径,进而消解以二元论为主导的人类中心思维。“物质动能”概念从本体论层面拆解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界限,为重新定义人类在周围物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重新阐释人类与物质世界的交互混溶关系铺设了文学理据。换言之,“动能”概念是帮助“物转向”文学研究实现突破非人类研究中心的关键引擎,而这一点也是标记21世纪“物转向”文学研究区别于传统意象批评的分水岭。不夸张地说,近十年活跃在文学批评前沿的批评话语几乎都内蕴了“动能”这一核心思维。尽管也有学者质疑非人类中心视角所隐含的悖论,如其

中潜藏的人类中心思维模式^②,但“动能”概念的革新意义在于,挑战了长期以来占据哲学主导地位的人文主义认识论,推翻了人类是唯一主体的认识。借助“动能”概念,文学批评和其他人文社科研究一起,在颠覆传统人文主义主客间关系的认识论的基础上,迈向以互动本体论为标志的“后人文主义的空间”^③。

归纳而言,对于物的动能和活力、物人内在互动、交互混溶关系的强调构成了新物质主义理论的核心要旨,也为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领域“物转向”的纵深拓进注入了决定性的发展动力,促成了近十年来物转向文学批评话语愈来愈呈现从“回归物”到“回归物质动能”这一衍进趋势。从当前不少文学批评领域的关键词来看,如“活力物质”“跨躯体”“赛博格”“物性”等,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以新物质主义为内核的21世纪“物转向”大潮的冲刷,出现了类似物质生态批评、后人类批评、情感生态批评等独特研究视角,开辟出一种具有明显非人类中心倾向的研究路径,深刻塑造了近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研究场域。

结论

如同在人文社科领域掀起的哥白尼革命式的变革一样,21世纪以来的“物转向”思潮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来自文学界的学者以消除人类中心执念的使命和情怀聚焦文学作品中人类与非人类的互动纠缠,从地球物种共生、共生、共荣的高度推动当代文学批评。近五年来,我国文学界出现明显的“物转向”研究热潮。学者们一方面积极借鉴和运用“物转向”前沿批评话语拓展文学研究视野和路径,另一方面也站在中国学者立场辩证审视、阐释西方文论思潮“物转向”的理论源点与发生逻辑,推动西方文论思潮“物转向”与中国本土“物与文学”研究传统的互阐互释,为中国话语走出去、中国气派人文社科话语构建贡献学术智慧。

当前,地球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覆巢之下无完卵”。无论是将人类拖向第三次世界大

^①Brown, Bill. *A Sense of Things: The Object Matter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03, pp.3-4.

^②张嘉如:《物质生态批评中道德伦理论述的可能性与局限》,《东岳论丛》2017年第1期。

^③Iovino, Serenella and Serpil Oppermann. "Theorizing Material Eco-criticism: A Diptych",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2012, 19(3): 448-75.

战边缘的俄乌冲突,还是人类所面临的以地震、高温、病毒为代表的危机和困境,都使人类有必要摒弃制造分裂和冲突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宏阔视野中开展东西方的文明互鉴,以多元文明共存、万物共生共荣的“星球思维”实现21世纪的文明转向。新物质主义理论源头之一的斯宾诺莎被誉为最具东方性的哲学家,而新物

质主义中流砥柱巴拉德的量子思维也被认为与东方的“生成纠缠”思维内在相通。因此,在21世纪“人类世、资本世、技术世”为标志的新物人关系时代,超越二元对立的西方形而上哲学,迈向“生成变化、生生不息”的东方思维,这或许是以变化互动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登场的契机,也为文学研究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学术机遇。

The Material Turn: Theoretical Progression, Core Evolution and Frontiers Generation of Literary Research Since the 21st Century

HAN Qi-qu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and promoted by the new human-thing relationship and the crisis contex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material turn theory develops further, and its theoretical core has been on its way of evolution in wester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material turn in the new century, whose core is new materialism, foregrounds the material agency, and redefines the entangling and interac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things, through undermining the predominant binary anthropocentrism.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material turn theory has brought about the trending of returning to material agency from returning to objects i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furthermore makes a distinctively new non-anthropocentric path, consequently generating the frontiers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past decade.

Key words: the material turn; the 21st century; evolu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re; material agency; frontiers of literary research

(责任校对 葛丽萍)